

—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

鲁迅 与鲁门弟子

耿传明

著



YZLI 0890092985

以鲁迅为中心形成的这一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色彩最为浓烈的图画，因此了解现代中国，不能不从认识鲁迅开始，而考察以鲁迅为代表的这种现代精神的流变，也不能不从鲁门弟子入手。



本书试图通过对鲁迅及围绕其身边的弟子们的切近观察、综合考察来描绘出这一在现代文坛上个性鲜明、举足轻重的激进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图谱和人生轨迹。



大家出版社

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

鲁迅 与鲁门弟子

耿传明 著



YZLI 0890092985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鲁门弟子/耿传明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1. 1

(20 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

ISBN 978 - 7 - 5347 - 6025 - 9

I. ①鲁… II. ①耿… III. ①鲁迅(1881 ~ 1936)—
传记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0972 号

策划组稿 张前进

责任编辑 张前进

责任校对 霍红琴 裴红燕

装帧设计 刘 & 王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7. 25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8. 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中国的 20 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 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下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

所谓的“克里斯马”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马”(charisma)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所以“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①。“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精神信仰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本丛书所包括的文化大师: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穆等大都是在近现代文化学术上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其中康有为、章太炎两位是活跃于清末民

^① 转引自汝信:《现代外国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初的政学两界的文化大师,对后世影响甚巨。康有为自幼期为圣贤,及长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而专注于义理之学,养心静坐。他曾于“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①,自谓进入了“得道成圣”之境。康有为融会中西,由现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说,在其时代起到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破旧立新效果;他积极投身政治、倡导维新变法,并吸引众多弟子讲学论政,其中以梁启超、陈焕章、徐勤等最为著名,他们形成“康门弟子”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门派,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时代变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章太炎则以清末“有学问的革命家”名标青史,他率先倡导民族革命,曾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出狱之后,革命之志更坚,流亡日本、宣传革命、聚众讲学、深得进步青年学子的敬仰,在他身边聚拢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门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成为了其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章太炎的学问“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在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种“究元决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以《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篇,对时代思潮、人生真谛等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独特判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至于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的先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青年时代的胡适就是一位颇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园春·誓诗》一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②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立

① 《康有为年谱》,《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页。

②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场,使他成为现代中国重“问题”不重“主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代表,在他身边也围绕着不少的追随者,以傅斯年、顾颉刚等最为著名。在学术上,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针,对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引、示范作用。至于周氏兄弟,则分别是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和巨石重镇,鲁迅是一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去世时获得了中国“民族魂”的盛誉,围绕他的鲁门弟子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也都在现代文学画卷上涂下了浓重的色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也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人的文学》成为新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但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做出了和鲁迅不同的选择,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周作人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这标志着周作人在文化立场上开始向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靠拢,他其后的散文创作也开始褪掉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之气”,走向平和冲淡,苦涩闲适。在他身边,围绕了俞平伯、废名等著名作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带有闲适、冲淡、唯美色彩的文学流派,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周作人又是中国民俗学、古希腊文学、明清文学的拓荒者和研究者,继承并发展其民俗学研究的弟子有江绍原,继承其明清文学研究的则有沈启无等。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也是现代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生活的20世纪是中国文化上急剧的“西进东退”时代,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一生为故国招魂”,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抗战时期撰写的《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国人必对国史具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对其时代盛行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正面的交锋和批驳。他一生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文化是否在现代还能占据一席之地的重大时代问题,他以其一生杰出的学术成就被尊为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的弟子余英时、严耕望等也都成为在学术文化领域声名显赫的

学者。

古人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在选择老师、朋友时，会本能地倾向于选择那些和自己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的人，师生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私学传统中在师生双向选择下形成的师生关系，更是一种情同父子的关系，选择什么人为师，也就意味着对为师者的志向、人格、学问的整体性的尊崇和认同，所谓“一日为师，终生是父”。学生对老师有一种孺慕之情，而为师者对学生担负的是与父母一样甚至大于父母的责任，所以这种私学传统中的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一种犹如家族血缘关系一样的文化群落。每个师徒群体自有其特质，成员的目标也基本相同，价值观比较相近，在思想行为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成员对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师徒群体的存在除了有利于他们戮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重大使命之外，还具有满足其群体成员的多种需要的功能：如使群体成员满足亲和与认同的需要；满足成就感和自尊心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信心和力量感。学生为自己所属的师徒群体感到骄傲和自豪，为师者对于学生也是关怀备至、提携扶持，不遗余力。像胡适的弟子罗尔纲专门写了一本书《师门辱教记》，十分动情地回忆了在胡适门下五年得到的言传身教。胡适对弟子的这本小书也十分看重，曾说此书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大。直到1958年，胡适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还自费印行了这个小册子，分赠亲朋。再如萧军直到晚年还骄傲地向世人宣称：“我是鲁迅的学生！”当别人问他20世纪30年代文坛宗派有哪些时，他的回答是：别人“有没有宗派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说，但是我萧军有宗派——‘鲁宗鲁派’！”^①由此可见师生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知识群体中的师生关系一般情况下是亲密、融洽的，但师生之间也会出现齟齬，像梁启超与康有为在

^① 秋石编著：《聚讼纷纭说萧军》，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张勋复辟”立场上截然对立、公开辩难，梁启超情急之下直言其师乃“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这使得一向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大为光火，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并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当然，两人多年的师生关系、患难之情并不会就此割舍，事过境迁后，仍会重修旧好，做学生的还是要向老师表示歉意和依顺。再如周作人1926年也因为不满于老师章太炎赞成“讨赤”，写了《谢本师》一文，表示不再认章太炎先生为师。这虽然从师生感情上来看不无遗憾之处，但也可从中看到现代个人独立意识对于传统单向服从性的师生关系的突破。与此相应的是为师者将学生革出师门的事也时有发生，像鲁迅之于高长虹、周作人之于沈启无等，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这种现象本身也提示我们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多是以群体而非个体的方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发表作品的报纸、杂志多带有同人的性质，社会文化资源也多控制在名家之手，所以被革出师门的沈启无等于被驱逐出了文教界，一时间只能靠变卖东西为生；高长虹则因为受了鲁迅的迎头痛击，长期被视为文坛异类，声名狼藉。总之，以这种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为单位，从文化社会学等角度，深入分析近现代文学、文化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对我们深入了解近现代文学、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本雅明曾经说过，“所有文明的文献都同时就是野蛮的文献”^①，也就是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标准，时间并不能将“野蛮”阻断于过去而在未来造出一个至善无恶的“美丽新世界”。章太炎早在清末就发表了他的《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

^① 转引自马丁·杰：《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化之用无所取。”^①故而至善无恶之境无从达致。历史乐观主义的虚妄在于其以对历史进步主义的信仰放过了对内在于人性深处的“恶”的警觉；以“新旧之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取代了“文明与野蛮”、“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历史乐观主义所持有的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及源于进化论的人性可臻无限进步论的信念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导叙事。对这种现代主导叙事的重新审视和反省也是我们今天更为深入地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必要环节。我们力图走出那种特定的、单一的、目的性过强、缺乏距离感的“第一人称叙事”，以一种更为客观、多元、审慎的态度来重审、讲述中国的“现代百年”，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理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术的进步依赖于一个可以商榷、辩难、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不在于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结论固化为绝对真理，而表现为不断地证伪与验错的过程，在假设与求证、质疑与抗辩中逐渐切近真实、将认识引向深入。从“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入手研究近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丛书的写作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更为坚实的佳作尚有望于未来。

耿传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

^①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载《民报》第七号，1906年9月。

引 言 鲁迅:现代文化的“创世英雄”/001

第一章 故乡记忆与文化渊源/013

1. “居移气,养移体”/014
2. 儒、道、墨、释之间/033
3. 门第、家世与“遗传”/039

第二章 “英哲之士”与“大独”人格/057

1. “私学”:作育“大师”的文化温床/059
2. “学堂”:制造“人才”的教育工厂/093
3. “帝国之眼”的凝视与超乎国族的立场/097

第三章 苏生与毁灭之间的二元选项/119

1. “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紧张和对立/125

2. 个人感情生活的灰暗与亮色/153
3. “借琐耗奇”与颠覆及构建/165
4. “跟上时代”与“四面受敌”/175
5. 小说:改造人生与“苦闷的象征”/180
6. 杂文:“寸铁杀人”与“活体解剖”/200
7. 散文、散文诗:幽深峭拔与独出机杼/203

第四章 “寻找革新的破坏者”/209

1.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鲁迅与授业弟子/210
2.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鲁迅与文学社团/252
3. “真的恶声”——高长虹其人/270
4. “朝花社”和柔石/286

第五章 “衣钵弟子”与“精神朝圣”之旅/297

1.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胡风/301
2. “识得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只愁”——冯雪峰/325
3.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聂绀弩/348
4. “传薪卫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踪!”——萧军/364

结语/399

后记/410

引言

鲁迅：
现代文化的『创世英雄』

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傅斯年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为理想和激情所主导的世纪,激情催发文学,文学催生激情,故而以情感表达为主旨的文学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一个激昂高亢而又波谲云诡的“文学政治”时代也就此开启。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新文学的创始人,在满打满算不过三十年出头的创作生涯中,以近千万字的著述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其人其作对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1936年10月19日,他病逝于上海时,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书“民

族魂”三个大字,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是一种罕见的殊荣。鲁迅的贡献与影响绝不限于文学自身,他更是一位在进步青年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文化批评家、社会批评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导师”^①。他也是现代中国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给予最高评价的中国人,毛泽东在1937年10月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就曾说过:“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②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的著名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给予了鲁迅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还曾说过他“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直到毛泽东晚年,1971年他再次旧话重提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③毛泽东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现代伟人,他对于鲁迅的情有独钟、高度评价显然不是偶然的、凭空而发的,而是建立在某种深层的心灵契合之上的,两人都是20世纪中国时代精神的最为杰出的代表。

鲁迅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殊荣,被冠于“民族魂”的称谓,决非偶然,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所产生出的一个空前的文化英雄,鲁迅可以说是晚清革命以来激烈变革文化的集大成者,一种渴求进步、永远进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作为作家,他的创作具有一种

①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桂林生活书店1940年版。

②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③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

截断众流、睥睨一世的“王者风范”和一种代表了时代的最高美德的高贵气质,其人其作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其耀眼的艺术才华使其后的文坛都笼罩在他的强光之下;作为以笔为剑的文化斗士,他具有一种纵横捭阖、杀伐决断的“凌厉之气”,他将素不起眼的杂文锻造成了得心应手、能以寸铁杀人的利器,在文坛取得了所向披靡的傲人战绩。他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至死保持旺盛的斗志,因而被其时代的新生力量视为导师和领袖。他总是站在弱者和被压迫的一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时代最高的美德和高山仰止的典范。……这样的鲁迅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化会成就一个“大写”的鲁迅?为什么鲁迅在现代中国拥有那么多的读者和知音,具有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力?为什么已辞世七十余载的鲁迅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以至要将“爱护鲁迅”提高到“道义”的高度?……这都是需要我们探究、思考的问题。

废名曾说一个大作家必须兼具“天才”、“豪杰”、“圣人”三种禀赋、品质,才能成就,是有其道理的。所谓“天才”者,指拥有卓越的才能和智慧;“豪杰”者,指具有敢于“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豪气和特立独行、不合众器的大独人格;“圣人”者,指具有博大之爱心、宽阔之胸怀,能够达到一种“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天地境界。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现代作家,的确只有鲁迅能庶几近之。鲁迅的伟大和杰出首先来自他“心力”的强大,他是一种主观意志力极为强大的人,兼具古人所讲的“剑气”、“奇气”、“侠气”、“豪气”这类创世英雄的人格气质,这是他能够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坛巨人的重要原因。从清末以来,龚自珍就开始呼唤这种拯救衰世的豪杰人格的出现,他极端强调的就是这种“心力”的作用,认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其后谭嗣同的“以心力挽劫运”、章太炎的“自贵其心”也都是这种呼唤的继续,鲁迅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这种浪漫主义创世文化的发扬光大者,他以别开生面、撼动人心的刚健之作,

一扫衰世文坛的萎靡绮丽之态，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起到了振衰起弊的作用，为中国文学的新生开辟了道路。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巨人，“鲁迅”之成为“鲁迅”的关键在于其对于“现代”之为“现代”的深刻理解与领悟，按照毛泽东早年的说法鲁迅可谓是“圣人”级的人物，所谓“圣人”就是得“大本”者，即宇宙终极真理之洞察者，而毛则自谦为自己只是“略得大本”，所以只是“圣人”的弟子——“贤人”级的人物。古代所说的“圣人”，指的是才德全尽的完人，儒家认为像夏禹、商汤、周武王、周公、孔子那样的人可谓圣人，古之圣人多与天道有关，所谓圣人被视为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得天命之人”。进入现代之后，宗教式微，圣人也完成了由“神”到“人”的进化，如西哲理查德·罗蒂所言“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①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现象。在前现代社会，给人们提供人生价值和意义支撑的是宗教信仰，正如《圣经》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在传统中国提供这种人生价值意义支撑的则是指示天道的圣贤经传。作为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的颠覆者，“现代性”突出表现为以一种人与神的对抗，未来与过去的对抗。人本主义的文化，赋予每个个人以探询真理、坚持真理的权利，肯定人的意志自由和自我本位。这就引发了人的思想、情感的大解放，而文学正是这种人性大解放的自由的表现天地。如此，文学文化的兴盛就成为了现代性时代到来的标志。再则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来自具超越性的天道，而现代性的文化则是一种废黜了来世和超验的现世的文化，其价值观和是非标准来自杰出的个人以及由这种个人所揭示的时代的真理，由此这种杰出的个人——“圣哲大士”以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真理也就成为众人寻找、追随、尊崇的对象。来世文化由此转换为一种现世的由杰出人物引导的“兼生文化”，也就是说人们希望从现世诸多的生存方式

^①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 2004 年 7 月 6 日在南开大学的学术演讲。